

改变现状 41 招

(三)

三思 主编

目 录

第 26 招：逢君之过.....	1
第 27 招：力避犯上.....	16
第 28 招：化敌为友.....	22
第 29 招：功成身退.....	27
第 30 招：以屈求伸.....	34
第 31 招：装病作傻.....	40
第 32 招：投上所好.....	54
第 33 招：溜须拍马.....	63
第 34 招：美色悦上.....	69
第 35 招：阳奉阴违.....	77
第 36 招：大奸似忠.....	82
第 37 招：以假欺君.....	88
第 38 招：厚颜残忍.....	96
第 39 招：空穴来风.....	101
第 40 招：口蜜腹剑.....	105
第 41 招：多留退路.....	111

第 26 招：逢君之过

这里的所谓“过”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罪过，一是指过错。

世界上最容易被控制的人，除了婴幼儿，大约就是那种浑浑噩噩、毫无头脑的半傻式的人物，许多心怀叵测的大臣就是想把国君变成这样的人物，他们逢君之恶，导帝为非，满足君上一切物质上、官上的需求，使君上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他们不只要蒙蔽君上的耳目，而且要迷惑其头脑。国君昏了，庸了，也就便于他们控制了。

*昏君喜欢奉承

台湾作家李敖说：只有混蛋才捧混蛋。话粗理不粗，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再深一层说，混蛋和混蛋在一起，会做出更加混蛋的事情来。“捧”，其实就是胡诌八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捧者固然心怀叵测，被捧者也很难说不是恶人坏人昏君淫主。圣明之主有为之人与臣下同伴，都会励精图治积极进取，不需也不屑阿谀奉承，鄙之弃之；斗志衰退不思进取者，嬉戏游乐不务正业，荒废政事残民以逞，必然喜好小人谀奉尽兴。小人献媚助力既满足了主子的需要，又可更牢地控制君主，可谓一箭双雕，险恶之极。奸谄小人助纣为虐最为得心应手，必欲推到极致而后快：声色犬马，贪污贿赂，暴虐凶残，嫉贤妒能，好大喜功，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互为奥援，因果纠缠，乌烟瘴气，愈染愈黑，加剧了社会的腐朽和丑败。试看历朝历代，

每个昏君的身前马后肯定都有一个两个乃至一群谄佞小人，反之亦然。

*逢君为权利

帝王之所以被人羡慕，有的人甚至不惜杀身灭族之祸，去夺取，去谋篡，归根结底就因为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大无边的享受，简单一句话，也无非是权、利二字。自古以来，真正为国为民的帝王能有几个？有的帝王、看上去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如秦始皇、雍正，究其本心，无非是怕大权旁落，帝位不保；还有的帝王，比较自爱，希望在历史上能留下个好名声，而不至于像桀、纣那样遗臭万年。一旦这些帝王认为自己的江山坐稳了，自我感觉名声也还不错时，他们便荒怠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玄宗，他早年是何等的励精图治，可到了晚年，“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他宠着个杨贵妃，“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更有那么一种帝王，连权力的巩固与否都不加考虑，至于史书如何记载他，后人如何评价他，这种身后是非，他更是连想也不想，当一天皇帝享一天福，尽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物质的、感官的享受，一直到被人推翻或精血枯竭的那一天。

奸佞们大多能抓住帝王的这种心态，所以他们导君为非，逢君之恶，既讨得了帝王的喜欢，又掌握了权力，这的确是擅权的最轻巧的手段。

*逢君的妙方

多少歹毒的阴谋都是在蒙着面纱下悄悄进行的。外表阴柔溜须拍马之人，却常常心怀恶毒，一旦得势，飞扬跋扈。官场、商场、名利场、人世场，定须明辨各种诡巧谄术，深察谄佞小人的暗藏杀机。

仇士良是唐朝后朝的一名大宦官，他一生历仕唐顺宗至唐武宗六位皇帝，专权达二十余年，先后有两个王、一个妃子，四名宰相死在他的手中，史称他“奸亦有术”，那么，他长宠不衰的诀窍是什么呢？他在晚年因老病而退休时，对前来送行的宦官徒弟徒孙们说：“你们还要继续侍奉天子，能听老天的一句话吗？”

众宦官自然是洗耳恭听，他说，你们要想权势不衰，就千万不能让天子有片刻闲暇，他一闲下来便要看书，就要召见一些有学问的大臣，听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样，他的智慧便深，思虑便远，就会减少玩乐和外出游幸之事，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就会恩薄权轻。从大家利益考虑，不如多多地增添财货，饲养鹰犬良马，每天都以击打猎以及声色去迷惑皇帝的心，使他纵情享受，穷奢极侈，沉溺其中不知休息，这样他就不会看重书本，不了解朝廷的大事，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恩泽权力谁还能夺得走！”

仇士良的这一番话，不只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历史上一切宦官控制皇帝的主要手段，经仇士良这么一点破，后世的宦官便奉为金科玉律。

还有一种尤为凶险，他们明知君上的举措为失政、误政、残政、暴政，不只不劝不谏，反而火上加油，推波助澜。你好大喜功，他便兴师动众，大动土木；你酷待大臣，他便搞罗织经，整人术；你自夸圣明，他便大造符端，鼓吹封禅。他们只想乱中取利，趁火打劫，至于国家的兴亡，百姓的疾苦，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

帝王们有所谓愚民术，殊不知臣下还有愚君术，像仇士良这种手段，不只是将帝王变成聋子、瞎子、哑巴，干脆就是将帝王变成毫无思想的傻子，变成只会吃喝玩

乐的行尸走肉，这才是愚弄君上最利害的一招。

这种声色马之好，不只是奸佞愚弄君上的手段，任何人都会受此愚弄，任何人也会以此愚弄人。人们曾经十分警惕于来自异己势力的糖衣炮弹(后来也不再警惕了)，而对于朋友、同事、下属的这种糖弹却甘之如饴，结果被拉下水的也不知有多少！

案例示范

*和士开的名言

和士开是南北朝时北齐武成帝高湛的宠臣，是一个有名的佞臣幸之辈，他劝高湛及时行乐的一段话，已经作为“名言”，被史书记载下来：“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

高湛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从此终日酣饮，不理政事，偶而坐朝，也不怎么开口，只是随意批写几个字，便匆匆退朝。到后来干脆连皇帝也不当了，传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这样连坐朝都免了，可以一门心思去享乐了。

*万岁爷和万岁山

在北宋首都开封的东门外，有一座规模宏大、穷奢极侈的皇家园林，名曰万岁山，占地十余里，山分东西二峰，最高峰达五百多丈，峰上楼台亭阁，极为华丽；峰下又有巨大的人工湖，湖中有岛，岛上有亭。整个园区，奇花异石，名贵树木不可胜数，其中有一块高广达数丈的太湖石，玲珑剔透，气象万千，矗立在万岁山之巔。

这座万岁山是由万岁爷、北宋皇帝宋徽宗命令修建

的，并供他享受。宋徽宗赵佶是一个风流天子，他诗词俱佳，书法绘画堪称双绝；但他也是一个地道的昏君，在位二十多年，内政不修，外侮不防，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将朝政完全委之于以蔡京为首的一伙奸臣。

这伙奸臣，包括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面力、李彦六人，被人称之为“六贼”。他们之所以能得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迎合徽宗奢侈的欲望，更加以推波助澜。蔡京发现皇帝对奇花异石有特殊的爱好，便勾结苏州的富商朱面力，在苏州及江南大肆征收，如果他们发现哪一家有名贵石木，便以黄表纸加封，称为皇家御用之物，令主人小心照料，若有损坏，便以大不敬治罪；取运之日，拆人的墙，扒人的房，闹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民怨沸腾。就这样，他们每年把掠夺来的东西，船载舟装，沿着淮河、汴水，直运开封，所经州县，拆桥梁、毁城墙。万岁山上那座巨大的太湖石，就是从太湖水底捞出，用几十条船连在一起运送的。

蔡京、朱面力之流，逢君之恶，导帝为非，果然捞到了极大的便宜，他们一门尽为显贵，终身恩宠不衰，而那些被他们掠夺的财物，十分之九全都中饱了他们的私囊。

北宋王朝在这批大奸巨蠹的腐蚀侵吞之下，迅速土崩瓦解，面对北方金人的铁蹄，不战而溃。万岁爷当了俘虏，老死异域；万岁山也在金人攻陷开封之后被夷为平地。

*桃园结“宠”

屠岸贾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灵公时任大夫，景公时任刑狱的司寇。

晋灵公和晋景公是两位昏庸无道、荒淫暴虐的君主。

他父子远贤臣，亲小人，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作为国家重臣的屠岸贾，不仅不去劝谏国君，励精图治，振兴晋国，反而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为二位君主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嬉戏纵乐，使国政荒废，民力空耗，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晋灵公一生荒淫无度，晚年尤甚，他用强行从民间征来的苛捐杂税，大兴土木，广修宫殿馆舍。有一次，他命屠岸贾在晋都绛州城内建一座花园。屠岸贾受命后找到各地的能工巧匠，精心设计，昼夜施工，很快建造了这座花园，园中筑有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此楼画栋雕梁，丹楹刻角，四周朱栏曲槛，富丽堂皇。凭栏四望，市井均在眼前。园中又遍植奇花异草，因桃花最盛，每到开花之季如锦似绣，故此园名为“桃园”。

竣工之后，灵公赞不绝口，心中就更加宠爱屠岸贾了。此后，灵公一日几次登楼嬉戏，或观览，或饮酒，有时还张弓弹鸟，与屠岸贾赌赛取乐。一天，屠岸贾召来艺人在台下献艺，园外则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灵公一时兴起，对屠岸贾说：“弹鸟不如弹人。咱俩比试一下，看谁打得准。击中眼者为胜，中肩为平，要是打不中的话，用大斗罚酒，你看怎么样？”屠岸贾欣喜应允。于是，两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高喊：“看弹！”一个个弹刃如流星般飞向人群，有人被弹去半个耳朵，有人被击瞎眼睛。顿时人群大乱，哭喊着拥挤着争相逃命。灵公大怒，命左右会放弹的侍从全都操弓放弹。一时间，弹如雨点般向人群飞去，百姓伤残无数，惨不忍睹。灵公见状，狂笑不止，连弓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他边笑边对屠岸贾说：“我登台数次了，数今天玩的最痛快。”

在屠岸贾的怂恿之下，晋灵公骄奢日甚。为了进一步取悦晋灵公，屠岸贾亲自率人到全国各地挑选良家美女，只要中意即抢夺回京，送入桃花园供灵公淫乐。此后灵公对屠岸贾更加宠爱了。只要身边侍者稍不如意，他们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戮。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饮酒，席间，晋灵公命厨师赶快做个熊掌给他们上酒。催了几次，还没端上来，灵公发怒，厨师只好把熊掌端来。灵公尝了一口，嫌其未熟，抄起铜斗往厨师的头上一击，厨师当场毙命，灵公又用力将其砍为数段，命内侍将碎尸盛入竹笼弃于野外。

灵公这种弃国自娱、殃民自乐的行径，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晋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可是做为一国之君的晋灵公对此全然不顾，仍以淫乐为一，不修国政。屠岸贾则以满足主子的需求为目的，极力设法搞许多新的花样，晋灵公在昏聩奢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家也就越加贫弱不堪。

晋灵公与屠岸贾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许多正直的官吏对此曾多次极言进谏，劝灵公收敛其种种不道之举，以仁治国，以德安民。对此，晋灵公是本性难移。而屠岸贾不仅不阻劝，还千方百计怂恿晋灵公迫害、杀害进谏的忠良之士。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昏君的保护之下，大售其奸，使其受宠的地位得以巩固，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其他人都难以得到的利益。

*童贯献名画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儿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宏钟，而且力大如牛，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

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颜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而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媼”（即“母”）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但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领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即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期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赵高酷刑悦君

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谀”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年仅十几岁的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笼络并讨好这位娇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应合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要，凭着他那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地就深得胡亥的欢心。秦始皇见了，也很高兴。后来，干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及狱律令法知识。

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秦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秦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迎合秦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秦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孤上其身，夺上之权**

帝王本来就是孤家寡人，可还有一些心怀叵测的大臣，用尽各种心计和手段，将帝王圈禁于华丽的宫殿之中，阻断他和臣下的联系，斩断了他的臂膀，堵塞了臣下的言路，使得君令不能下达，臣情不能上通，这样，帝王便成了瞎子、聋子、哑巴、傀儡，胜败不知，祸福不闻，只能听任专权大臣的欺骗、摆布。

这里所说的夺君之权，不是指大臣篡权夺位，取君上而代之，而是指“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还是天子，权力完全被权臣所掌握，天子的言行举止完全由权臣所控制，甚至连生死去留都取决于权臣。

媚君、欺君的最终目的便在于此。

***封锁信息孤君**

不要以为这些听人摆布的国君都是一些弱主、暗主，雄强的国君也是很容易被孤立的。国君身居九重宫禁，

通往他的信息渠道本来就是既少而且窄，在这窄小的渠道上，又横梗着一道又一道关卡，立着一个又一个各怀鬼胎的把关大臣，他们将那本已少得可怜的信息，又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国君的口味加以改头换面，或者干脆加以截流，对国君实行消息封锁，这样国君又怎能不被孤立呢！

“百官奏事先报长官，长官报宰相，宰相奏皇帝”，元载所创立的这一套奏事程序，实在是控制言路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想象，百官之奏到了长官那里必定会有一番取舍，到了宰相那里又有一番取舍，他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肯定是取其同而舍其异，取上之所好而去上之所恶。经过这么个取舍三部曲，到了皇帝那里还会剩下些什么呢？只会是有利于长官，取悦于皇帝的一面之词。这样的奏事，不要说反映民情民意，连官情官意也反映不了，所反映的，不过是三几个人的意志罢了，皇帝实际上是被这三几个人牵着鼻子走。

遗憾的是这种谬误不只见于古代，元载的这种手段，到后世似乎成为一种制度，材料需逐级上报，意见需逐级上转，若有人敢越级，便被视为大不敬，轻则革职，重则坐牢。试想处在这种信息渠道终端的人能得到多少真实情况？而根据这种片面情况所作出的决策，又如何能符合下情？决策者也许自以为是在为黎民百姓，其实不过是他的圣衷独断，甚至是受制于人。大书法家颜真卿那震聋发聩的话并不过时，而他的悲剧性遭遇也没绝迹。

*去掉君主的左右臂膀

君上为了防止臣下结党营私，时常采用“断其羽翼”的办法，而臣下为了架空孤立君上，也会采取“去其臂膀”的办法，将君上所倚重的势力排斥甚至产除。石显

用的便是这个办法，萧望之同汉元帝的关系很密切，早在元帝为太子时，萧望之便是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太子继位以后，一般都成为重臣。比较起来，石显同元帝的关系便疏远些，他要保持固有的地位，自然不能让这种人留在皇帝身边。一个懦弱的、毫无主见的帝王，一旦失去了老师的辅佐，只能听石显之流摆布了。

案例示范

*一叫就赶走

唐朝，每当皇帝上朝时，总有八匹马肃立在宫门两侧，充作皇家的仪仗，直到散朝时方才撤出，这种马叫“立仗马”，是由御马厰中挑选出来的最优良的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成，它们吃最好的草料，得到最周到的照顾，但在宫门外立仗时，绝对不许嘶鸣，只要一鸣叫，便再也没有资格充当了，被发配去干拉车载货的苦役。

李林甫在当上宰相以后，要独揽大权，不愿意有人对朝中大事有所议论，便将所有的谏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如今明主在上，臣下只要顺从主上的意思去办就可以了，用不着多嘴多舌。你们看到立仗马了吗？它吃的是三品草料，但只要在朝堂前一叫就要被赶走，去干那拉车载驮的苦活，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此，大臣噤若寒蝉。几年以后，唐玄宗下令，将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召集到京师，加以考试选拔，以为朝廷所用。李林甫害怕这些来自民间的人会揭露他的罪恶，便对玄宗说：“这些应试的，多是一些卑贱愚昧的人，恐怕会有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言俗语沾污了陛下的视听。”阻止了玄宗与这些人的直接接触。结果，由他主持的这次考试，全国竟没有一个人入选；李林甫反而上表

皇帝表示祝贺，说是：“野无遗贤，”即天下有才能的人都已集中在朝廷，民间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了。其实，在这一次考试中，有许多才艺卓绝的人，如伟大的诗人杜甫便参加了这一次的考试。

李林甫既阻断了大臣的言路，又压制了民间的舆论，将玄宗与外界完全隔截开来，成为一个有耳听不到正确的言论，有眼看不到真实情况的聋子、瞎子。

***有事先经过宰相**

唐代宗时，奸相元载专权，他唯恐众大臣上书揭露他的罪恶，便对代宗说：“以后朝中百官奏事，先禀报本部长官，长官报告给宰相，然后由宰相上奏。”接着又以皇帝的名义颁下一道谕旨说：“近日各部门上奏的事情太多，所奏的又多是一些攻击他人的事，因此委派各部长官、宰相先行审查，决定是否上奏。”

这样一来，他便控制了言路，皇帝被架空了。对此，刑部尚书颜真卿激烈地表示反对，他上书说：“朝中百官是陛下的耳目，现在让上书奏事的人都要先报告宰相，这是自掩耳目。陛下如果担心臣下进谗言，为什么不考查一下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所说的确是假话，应当处死；如果是事实，便应奖赏。不这么作，会使天下人以为陛下厌烦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以所谓谗言为借口而堵塞天下的言路，我实在为陛下惋惜……天宝以后，李林甫任宰相，最痛恨提意见的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上意不能下传，下情不能上达，相互蒙蔽，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国家破败成今天这种情形，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即使国君大开言路，群臣都不敢充分大胆地发表意见，若是再让宰相大臣加以取舍压制，那么陛下所能接触的，不过三几人而已。天下的人从此钳口结舌，陛下看到没

有人再提意见建议，便会以为天下平安，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这不是李林甫重又出现在今天吗？”

颜真卿如此痛切陈辞，昏庸的代宗依然没有觉悟。元载自然十分痛恨颜真卿，便将他赶出朝廷，贬至千里之外的峡州。

*挟天子以令诸侯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曹操在三国争雄时所采取的一个主要谋略，也是他政治上取得主动权的重要原因。这个被挟持的天子，便是汉献帝刘协。

刘协从 9 岁登基，40 岁下台，在位三十余年，当皇帝的年头不能算少。可他这一生，历尽艰辛，先是被董卓裹胁至长安；后来又被李傕、郭汜控制，辗转流徙；最后终于落入曹操之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没车可坐，没房可住，甚至没有饭吃；而作为一名皇帝，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却是始终没有掌握过权柄。

对曹操来说，他只不过是用来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一切行动起止，完全得听命于曹操，自己丝毫作不了主。刘协曾悲愤地对曹操说：“你若是能够辅佐我，那是最好；若是不能，求你开恩放开我，让我下台！”曹操自然不会放他下台，但从此再也不肯见他。

刘协不甘于这种傀儡的地位；曾经两次试图抗争，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是在公元 200 年(建安五年)。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定都会记得“衣带诏”的故事：刘协为了产除曹操，将一封密诏缝于衣带之中，赐与董贵妃之兄、国舅董承，命令他去联络反曹的力量，不料密谋败露，董承等七百余人俱被曹操杀害，连那怀孕 5 个月的董贵妃也未能幸免。

第二次是在公元 214 年(建安十九年)，由伏皇后传书与其父伏国丈，求他设法除掉曹操。据《三国演义》描写，这封密书是由一名太监藏在头发中带出宫去的，在取得伏国丈的回书后，又由这位太监藏在头发中带回，不料被曹操看出破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曹操宣布废黜伏氏皇后的身份，并派兵入宫，从夹壁墙中将伏皇后搜出，可怜本来应当是至尊至贵的皇后，此时却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的拉出宫去，当她经过前殿时，可怜巴巴地向坐在上面的刘协泣求道：“你不能救我一命吗？”

刘协掩面而哭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皇后被幽禁而死，她所生的两小皇子也被毒死，兄弟宗族株连而死者达百余人。

第二年，刘协被迫让位于曹丕，东汉至此宣告灭亡。

*受制于家奴的皇帝

有一次，久病初愈的唐文宗闲坐思政殿上，将在朝堂值班的学士周墀召来聊天。他问：“你看我可以同前代的哪些君主相比？”

大凡提这种问题的皇帝，总是希望听到臣下说一些阿谀奉承之词的，周墀果然回答：“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

哪知文宗却摇了摇头：“我怎么敢和尧、舜相比！我之所以要问你，是要知道我比周赧王、汉献帝相差多少？”

周赧王是东周最后一代君主，汉献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周墀一听此言，十分吃惊，忙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怎么同陛下相比？”

唐文宗痛苦地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势力强大的诸侯、大臣，而我却受制于家奴，就此而言，我还不如他们？”说罢，不由的涕泪沾衣。

唐文宗所说的家奴，指的是宦官仇士良。

宦官这种人，有时称太监、内侍、中官，鄙视他们的，也称他们为阉人、刀锯残人、刑余之徒。这种人由于生理残缺，已不能再破坏女人的贞操，历代王朝都用这种人在宫中执役，原也不过是专干一些看守门户、洒扫清除之类的粗活，是服侍皇帝后妃衣食住行的奴才，地位十分卑贱。可是，他们终日生活在皇帝身边，接触皇帝最多，也最能对皇帝发生影响，其中一些奸狡之徒，不免要干预国事，轻则对大臣的是非功过、升降任免议论可否，重则对国家大政的兴废得失指手划脚，有那么些昏弱的皇帝终于被他们所左右，以致听任他们专断朝纲。这种人大多目不识丁，足不出宫，能懂得什么治国道理，能晓得什么天下大势，又能提出什么兴国安邦之策呢！无非是狐假虎威、揽权谋私罢了，如此一来，这些无力破坏女子贞操的人，倒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

唐朝是一个宦官为祸甚烈的朝代。唐朝第一个参与政事的宦官便是唐玄宗时代的高力士，不过此人倒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至死都像奴才一样效忠玄宗。从他以后，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玄宗以后，唐朝共历一十四个皇帝，其中竟有十二个，或由宦官所立，或由宦官所废，或由宦官所害，或被宦官所挟制。

唐文宗也是被宦官所拥立的，他即位以后，却想铲除这股势力。公元 835 年(文宗太和九年)，一批大臣在他的支持下，以宫中一株石榴树上降下甘露为名，想将宦官诱集在一起，一举杀绝。不料事机败露，所有参与密谋的大臣全被仇士良一伙宦官所杀害，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从此之后，文宗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朝中大事全由